

題目：《火紅年代的天主教大專聯會》(題目為編輯所加)

受訪者：馬國明

訪問者：羅永生、吳國偉、劉劍玲

訪問整理：劉麗凝

天主教大專聯會本來是屬於聯誼性質，為耶穌會余理謙神父所創。在第十四屆(1974 年)大專聯時我剛入大學，當時大專聯出現了一個方向上的轉變，我也不知道為何會出現這個轉變，但這個轉變的出現是很清楚的。當年他們開始提出一個口號：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，即是「與貧窮及受壓逼者站在一起」，並且提出教會要本地化。本地化的意思不是要找所有香港人，而是要「關心本地事務和本地的社會問題」。當天主教大專聯會提出了這些全新的觀念和口號，他們也開始嘗試接觸解放神學。

當時大專聯主要的工作是舉辦領袖訓練營，然後邀請同學參加，大家在營會內會聊一些很尖銳的社會問題，甚至是討論帝國主義.....不過主要都是內部討論，而不是邀請甚麼名人來講話。當時大約有三、四十人參加訓練營，整個訓練營可以長達一個星期。當時的訓練營的命名為「出谷」，意思是「出埃及記」，這個名字是來自「解放神學」。《出埃及記》清楚講明我們相信的神不是一個創造了世界就去度假的仙人，雲遊走了後不理世事，相反神是參與歷史和解放奴隸的神，當時是有這一層面的理解。我不知為何出現了這些觀念，因為我 74 年剛入大學，但這轉變很明顯的。

這個訓練營的籌備過程很認真，他們為訓練營成立一個約五至六人的籌委會，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商議訓練營內要討論的內容和尋找資料，然後用油墨印一本冊子派給參加者，供大家討論時參考。籌委成員是那一屆幹事為主，然後再邀請其他有心人協助。

坦白說，我考了三次高考才考入大學，74 年入大學時大部份同屆的中學同學已經是 final year。我入大學很簡單、很單純，沒有什麼政治立場，亦不是好醒目的那種人。入學校後就被史文鴻拉進 KATSO，有時也去天主教大學聯會。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人與我過去接觸的人完全不同，他們做事那麼認真，講的事情是我聞所未聞。他們當時不講馬克思，而是講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，又講「上帝是解放的神」。

我 77 年做大專聯第十七屆會長，大方向已定清楚，就是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。時間上會否與當時學運有影響，我相信是很有可能。我後來重新看我們這些人，發現大家的意識形態是相當多元的，所以後來我們這班人中，有些人加入「托派」，例如劉子濂。好像劉山青，他沒有正式做幹事又不是教徒，但大家經常一起聊天和開會，所以與我們的關係很好，跟吳仲賢也很熟絡。

當時天主教有三個神師，神師的影響力很大。其中兩個是神父，一個是美國瑪利諾會，另一個是 PIME(米蘭外方傳教會)。我們經常「無大無細」對神師直呼其名，當大家是朋友。神師的角色是顧問，神父可以隸屬修會，如陳日君是慈幼會，也可隸屬教區。隱修那些開始是 one man band，歷史上可能是某一位聲望高的人，其他人開始請教他跟師父，如本篤、道明會，都還保留，這些修會起源是隱修，去沙漠隱修到出名，收徒弟。整個 monastic movement 也是這樣來。到後來聖方濟各，都是這樣。

(吳：這些神師如何？)

三名神師都很開明，不過他們知道的事不比我們多，特別是社會問題，甚至是「解放神學」。相對而言 PIME 知道的事最多，雖然在三位神師之中他的資歷屬最淺，還未升神父，但他的背景其實很有趣，他是米蘭人，而米蘭一直是意大利的左派重鎮，所以他至少認識意大利左派，亦懂得 Gramsci 是誰。但若果要討論香港的問題，或者再拉闊一點來說，例如當時討論 Andre Gunder Frank 的《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》(1966)，是熱潮來的。那時神師不太認識這些理論，因為他們的訓練甚少接觸這方面的知識，反過來是神師們從我們這邊學習這些理論；所以這三位神師算是非常開明，而最有趣的是這些神師都是主教委派的。當時的主教是徐誠斌，他的立場不算保守，所以差派了三名開明的神師過來，也不會太管制我們。他們也認同我們提出的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的理念。我不覺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改變是因他們的關係，天大聯的改變在 74 年，是一個很清晰的、方向上的轉變。我估計因為當時整個大專環境的影響居多，而我們是從信仰層面取相應的資源，例如真福八端其實是在回應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。

(吳：你們會否勤力讀聖經？)

我們天主教教徒很慚愧，沒你們那麼勤力的去讀聖經。我們每星期日的崇拜都會從新舊約聖

經裡選取三段經文，每星期選不同的經文，所以聽得多大概都了解。由我最初接觸天主教大專時就出現了這個轉變，所以我未能解釋這重大的轉變的由來，但我們當時有另一個口號：『基督教大專生雙重使命兩肩承，雙重使命是「教會」和「社會」』。

《曙暉》／曙光的淵源

《曙暉》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，性質如中大的《中大學生報》一樣。《曙暉》架構是頗特別，每年幹事會有九人，其中一個是出版幹事，順理成章要負責出版《曙暉》；但事實上一個人無法擔起整份《曙暉》的出版工作，於是出版幹事需要另外去籌組班底。這是一個天主教徒的組織，不過這天主教組織很開放，甚至連幹事會本身都不一定要是教徒，試過有幾屆有非教徒，覺得大家聊得來就做了幹事。

《曙暉》的班底非教徒成份更多，特別是我做會長那一年。史文鴻是十六屆剛落莊就去做《曙暉》，他當時在中大讀研究院以及成為導師，然後找了一班厲害的哲學系學生，全部跟他去做《曙暉》，而這班學生都不是教徒來的。我做會長的那一年，《曙暉》的班底非常強勁：包括史文鴻、張彩雲。其實天主教還有其他的青年組織，例如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會 (Hong Kong Catholic Youth Council, 簡稱 CYC)，張彩雲屬於的 CYC，這是中學生的天主教組織。他們 CYC 被分配的房間就在天主教大專聯會旁邊，所以我們很熟悉大家；張彩雲沒有成為天大聯幹事，但有去參與《曙暉》，因為《曙暉》較靈活，有興趣的就可以參加。我們當時分工很民主，《曙暉》是分開幾個小組，如：國際組、時事組和文藝組，各組自己先聊有甚麼重要課題，聊完看誰願意寫就寫文章。

(吳：《曙暉》班底有多少人？)

有十多人，最高峰時有二十個。當然人是很流動的，可以隨時進出。吳國昌和他女友是「國際組」。我們整班人都無分教徒與否。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報導七九、八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運動。當時中文報紙不會提及，我們就自發組織讀書小組，由吳國昌的「國際組」內七、八人搞讀書組及四出找尋資訊，後來出版了一份專輯，出版過後還意猶未盡，就乾脆出版一本書籍；列印後，我就拿著這本書到處去找二樓書屋寄賣。好可惜我搬過幾次屋就丟失了，那個封面好簡單，只是啡色封面。其實只是因為有勇氣，也不怕醜，亦不會考慮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夠。

(羅：對波蘭的興趣有沒有特別原因？是否與天主教有關？)

約望保祿二世的原因是次要的，反而是我們自己覺得波蘭團結工會是很大的突破，因為他們可以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可以突圍而出，可以有獨立的工會，這個才是主要的原因。不過那本書主要是由吳國昌負責，還有一個女生，現在在港大心理學的林瑞芳，她是來自中大歷史系，也在這個國際組，當年有七八人一起搞。

(吳：以前出版《曙暉》是否很困難？我見有些《曙暉》是用手寫的)

以前要用中文植字，電腦未普及，需要依賴植字公司，它們打字後替你沖菲林般沖曬出來，出來的效果會好多了，然後你帶回去剪貼。植字其實都是中文打字，不過就多一個步驟，就是沖曬出來，因為單是中文打字看起來仍然很模糊、粗糙的，其實是用日本技術植字幫你打字同排版，就再用沖膠片的技術，做出來就清晰好多。

《曙暉》一年出版四至六期，我們列印只是用來派發，一直只有支出沒有收入，所以要自行想辦法去籌錢。有一次我們開會討論如何籌款，不知誰提起可以搞書展。但要找書的話，人人都懂得去二樓書屋如田園或樂文取書，後來不記得誰提出訂購英文書籍的提議，認為賣英文書才有特色，然後獲得大家一致贊同。

我卸任大專聯會長後就加入《曙暉》，我當時對訂書相當感興趣。由於當時沒有互聯網，所以我用最原始方法，就是走到圖書館的書中查找出版社地址，最後找了幾十家出版社的地址，然後我用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信紙及天大聯會長的名義，先後寄出了二、三十封邀請信。信中寫：「我們是一個學生團體，現正進行讀書小組，但香港很難買到書，你們出版社可否給我們窮學生提供一些折扣呢？」你可以想像，如果你是一間大出版社，然後收到學生寄來這種的信件，一定會丟去垃圾桶。但我當年仍收到六、七個回覆，他們說很欣賞我們，可以給優惠折扣，並且附上書單。原來這六、七家出版社都是大有來頭，例如：美國的 **International Publisher**，雖然他們的書單提供的書籍不多(八至十本)，但其中一本是《**Prison Notebook** (獄中札記)》，直到後來我才知這是第四國際的出版社。

另外有來自英國的 **Merlin Press**，他們出版的書不多，但盧卡奇的書全部齊全，是一間左派出版社。還有間叫 **Beacon Press**，原來是美國清教徒貴格會出資支持的，當時好有趣，因為

有齊所有 Frankfurt school 的書，當時 Frankfurt School 仍未十分出名，但 Herbert Marcuse 的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和 Jurgen Habermas 的早期著作全部都給出版了。還有一間叫 Siberry，是有天主教背景，這間出版社的書包括 Max Horkheimer 的《Critical Theory》及《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》。事後回想就發現好奇妙，反過來如果是大出版社如 Cambridge 聯系和支持我們，那我們就慘了，過萬種書，訂哪一本都不知道。當時只有這些左派出版社，有教會背景的，書不多但精。

(羅：你當時搞《曙暉》考慮讀甚麼書和理論，組織的人並沒有太大的傾向或想法？)

沒有。史文鴻當時最博學，他介紹我讀好多書，例如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。我在大學二、三年級時已經看了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；吳國昌亦看好多書，我們個別也會看一些書，如《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》。《曙暉》開會沒有任何 agenda，大家平起平坐，大家編委會坐下聊要寫甚麼，甚麼是重要的，以及誰夠膽應承去搜集資料及寫文章，就是如此運作。當然無可避免地史文鴻、我和吳國昌會多講些話，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 agenda。

(羅：但史文鴻、你與吳國昌的閱讀興趣從哪來？不像是某個教授引導的，怎樣找到這些書？圖書館內有的？還是從其他渠道找回來？問朋友借？還是買回來？那個年代買書應該很不方便的。到底是如何開始的呢？)

當時圖書館沒有這類書籍，要自己找的，例如史文鴻在中大找書局幫他訂書。有時他豪爽地多訂一本送給我，例如 Walter Benjamin 的《Illuminations》，是我大學二、三年級的時候，這本書也剛好出版。有一日，他見到我就把書塞過來，說：「馬仔，這本正呀！」所以史文鴻是我的啟蒙導師，雖然我們現在好多看法不同。至於史文鴻是怎麼知道的？有時這些東西一讀開會就「one thing lead to another」，例如當時很多人已經認識 Marcuse，而他的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亦廣為人知。港大那班同學(如：曾澍基)，只要你是關心學運的話就會聽到。就如我當初入大學懵懵無知，但也聽過「存在主義」這四個字，然後又聽到卡繆、沙特、尼采、祈克果、卡夫卡等人名。

(羅：但如 Frankfurt school 這一類，台灣不會有人討論或寫這些東西，為甚麼第一批用中文來書寫的人是香港人？)

如果說 Marcuse，曾澍基在很早期已經寫過這些文章，並且引用 Marcuse 去分析香港的階級鬥爭。我記得他的論證裡引用了 Marcuse 的講法，就是目前階級鬥爭的重點不是傳統的工人階級，而是轉為白領階層。例如當時香港的罷工多由黃偉雄的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」，又例如當時社工開始搞社工總會。曾澍基在很早期已經寫香港的階級鬥爭，而不是階級分析，就說階級鬥爭的重點轉到白領階層，例如教協這些都是白領來的，所以很早期就已經有很多香港人認識 Marcuse，加上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不太難，然後透過閱讀 Marcuse 的書後就知道有 Frankfurt school。

(羅：我理解當時有幾個特別熱衷這些新和左翼批判理論的人，嘗試將左翼理論引入香港，我看到有其他同期很激進的出版物，它的特色是著重理論的部份，那麼《曙暉》如何？)

史文鴻、吳國昌和我曾接觸過這些理論，但當時我們心態是沒有任何 agenda，我們整個編委大家互相衝擊引發興趣，唯一最明顯的是波蘭團結工會那次，我們感到是重大轉捩點，而且完成專輯後仍想出版一本書籍。我們開會大家聊時都覺得重要，所以自己到處找資料大膽去寫，不怕被人笑。

(吳：誰人讀你們的《曙暉》？)

我們是派發，怎麼派我就不記得了。

(羅：校園擺就有人拿，那時《學苑》在報攤可以買到的。我當時中學時期有買，如七四年托派的四反運動。七十年代是青年學運最蓬勃的時期，我當時是中學生，很仰望大學生。我印象在大學才接觸《曙暉》，就是 79 年的波蘭工會的那些。)

我們每一次都印刷幾千份刊物，在港大、中大、理工和浸會內派發，當年派發的細節我已不太記得了。因為賣英文書這策略相當成功，所以單靠每年的書展賣書所賺取的收入就足以維持《曙暉》的出版經費。

(羅永生：當時買英文書的渠道少？)

是啊。當時搞書展，學生會的人只聽過《Prison Notebook》、《History and Class

Consciousness》等書名，但從未親眼看過，於是覺得我們可以把書訂到香港很厲害。我們在大專聯會會址(太子道明愛中心)擺檔，然後我們四圍貼街招，更吸引了丘世文前來買書。KATSO 的活動主要留在大學內舉辦，我們就透過港大、中大 KATSO 的協助預訂場地擺檔，這樣就能夠維持《曙暉》全年的開支。有幾本書真的次次都賣光，特別是《Prison Notebook》、《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》、《One Dimensional Man》這三本書，因為中大、港大學生會的成員即使不讀也會購買，後來找到方法訂 Althusser 的《For Marx》亦供不應求，因為當時大專院校之間較活躍的大學生都會買這些書。

(羅永生：如何做宣傳，讓學生都認識這些書？)

他們自己在裏面講，如《學苑》的呂大樂、吳俊雄，聽聞呂大樂、吳俊雄做學苑時就寫文諷刺港大老師甚麼都不懂，如吳俊雄很熟悉 Laclau，然後在《學苑》講一大堆新左的東西，並指大學老師不懂，上課又不提。港大有曾澍基、陳文鴻、黎則奮合辦一山書屋，逢星期日讀 Althusser。

港大有個叫做社會派，中大沒有這麼明顯，但如畢浩明和陳慶源等人搞新青學社，只要不是國粹派就會來惠顧，因為國粹派就不會接解這些東西。當時有西方馬克思主義，當時在新晚報做的馮偉才，他專門做西方馬克思主義專輯，他又找我和陳冠中，拉了幾個人去做個研討會，後來有個全版的專輯。因為當時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來頭，如法蘭克福學派、盧卡奇、阿爾圖塞等都被歸類為西方馬克思主義，

(吳：當時有沒有引起論戰？)

當時港大有一些人(如：黎則奮)，他們畢業後佔了個地盤，然後突出自己是「新文化人」；他們用這個身份去批評舊文化人，當時曾經發生過論戰。他們舉辦了一次研討會：「害怕也沒有用，新文化人來了」，後來在 79 年辦了《文化新潮》。之前主要是黎則奮突出自己「新文化人」的身份，討論新舊文化人有什麼不同，其實主要批評當時寫報紙專欄的人。羅永生的書曾寫過，國民黨三十年代派人來港佔據香港的文化地盤，所謂舊文化人就是指這些人，Q 仔試圖與他們開火，他有幾個筆名：李亞飛，他寫色情故事，又寫馬經，欲望本身都是革命。

(吳：爲什麼喜歡用筆名？)

貪好玩。史文鴻的筆名是「豬仔」，我的筆名是「騾仔」，吳國昌的筆名不記得了。我們只是學生，膽粗粗寫東西當然用筆名。

(羅：台灣人寫東西的人可以建立崇高地位，所以對名字是非常執著，但香港寫的人全是學生。)

當時香港的情況是因為報紙地盤已被霸佔，這些都是長期飯票來的，五六百字風花雪月，寫甚麼都可以，所以學生是不要妄想可以在報章佔到地盤。Q 仔是一個例外，因為他的辭鋒厲害，Q 仔和曾澍基很厲害，我們把他們看作為「老大」，曾澍基說話技巧一流，既清晰又流利，可以臨場發揮。

(吳：《曙暉》有沒有辦研討會？)

《曙暉》是純粹自己討論。若你講當時大氣氛，當時主要是港大的社會派辦論壇。

(羅：當時 KATSO 透過《曙暉》搞思想性、讀書和理論為主的活動，你認為《曙暉》對當時的環境，大環境是社會，小環境是大專同學界，有甚麼影響？)

我不覺得有甚麼影響，最大影響是自我教育，若不是「圍威喂」自己搞，四年大學會讀到甚麼出來呢？我可以分享一個笑中有淚故事，我 Final year 要必修一課「中國近代史」，畢業考試時要三小時答六題選答四題，其中一題是：「試論馬關條約的影響」。這題目我在考 A - Level 已經答過，答案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我讀完四年大學，我的答案跟高考沒有甚麼分別，不外乎那幾點，唸四年大學就是如此。若不是那四年自己跳出大學的圈子，自己「圍威喂」，敢於接觸波蘭與工會這些題材，你會學到甚麼出來？

(吳：天主教會讀到你們寫的東西嗎？)

讀不到的，其實天主教那邊是很傷感的。首先應該是我做會長前，大概 75、76 年，我們天大聯架構如此：我們叫做「大專聯會」，因為我們這個是 Group Membership，屬下是不同院校的 KATSO，包括港大、浸會、聯合、新亞、崇基和三間師範的 KATSO，共有九個，

會員就是這些 KATSO，它們就是大專聯會的會員。75、76 年聯合 KATSO 要退出，因當時聯合 KATSO 神師說我們是「左仔」，即天主教大專聯會是「左仔」，這就是神師的影響力，因為聯合神師覺得我們是「左仔」，所以他們就要退出，當時是很傷感情的。當年我們做了很多事情，嘗試和他們溝通，但神師的影響最大。

(羅：這反映天主教一些保守勢力覺得你們脫軌了，所以就要退出。當時整個大專是否只有聯合退出？這會否影響香港天主教的主流體制如何看你們？)

當時香港天主教都不理會我們，我們只是一班學生。另一個傷感是在我做會長那一年，正值是 75 年的金禧事件，當時金禧校長梁潔芬修女與天大聯關係密切，所以我們的身份很尷尬；但當時金禧的老師中有兩、三位是天大聯「老鬼」，一個叫列國遠，一個叫湯鵬舉，這些「老鬼」第一時間走來聯會找我們分析問題，所以我們就很快站在他們那邊支持他們，其實是很尷尬的，因為校長其實不支持這件事。我們就勇字當頭就去支援他們，後來這件事很快被司徒華主導了，當時他們罷課，然後老師帶學生去主教府靜坐。

當時所謂的社運界在教協開會商討對策，自然地司徒華就擔任主席，當時甚麼人都可以去參與會議，包括托派，不過不是吳仲賢、梁國雄出席，當時出席的叫李懷明，還有一兩個人開會，但我只記得李懷明。托派起身發言，講兩講又被司徒華「扑低」。「金禧事件」開會次數多但沒做太多行動，主要都是做聲援。學生組織唯一做的，就是自己辦一份《金禧潮》，由中大學生報、天大聯和港大三個單位合力搞，大家都出錢出力。出版《金禧潮》後就走到學校區(牛津道)派發，目的是要引起中學生的關注，結果大概出了三、四期。我做會長那年申請了停學，那年活得好精彩。

那年停學雖然不用上課，但我好有紀律，記得當年最早的車在早上 7:50 由旺角開出，每天都乘搭頭班車入中大，然後去到崇基圖書館，感覺非常好，整間圖書館都沒有人，好像整間圖書館都是我的。我每天一早就入圖書館看書，一口氣看了《For Marx》、《Reading Capital》、《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》、《Legitimation crisis》.....不知道為何自己會如此勇敢，其實並不是太明白這些書，但就讀下去。

(吳：這些書跟當時的環境有關嗎？)

我讀的時候，特別讀《Legitimation crisis》的時候，我覺得是與當時的環境是相關的，當年我就去讀這些艱深的書籍，午飯後又繼續讀，直到下午要開會就坐車回市區。所以當年一邊搞學運，同年我也看了很多書，又跟隨史文鴻去旁聽勞思光講康德的課，都有點得著；我又上沈宣仁的宗教哲學課，講論證神存在的...我以前都像都聽過的；當時崇基有個信義宗的牧師，我們稱他 Dr. Deutch，他精通希伯來文，有旁聽他的舊約聖經課，

(吳：這些對你的神學的衝擊嗎？或是你們衝擊他們？)

當時 Dr. Deutch 的態度開放，他知道我、史文鴻和張耀良是天主教徒，我們慕名去聽他的課，大家沒有芥蒂。我最深刻印象的是探討我們應如何理解《創世記》，因為涉及進化論之類的事情，而他很強調「舊約聖經創世記是寫給公元前六、七世紀的人閱讀的」，很強調放在當時的脈絡去理解《創世記》的話，就會明白和欣賞其寫法有革命性，因為當時的中東是多神教背景，例如希臘神話就很明顯，只要是大自然都是神明，然後《創世記》就強調大自然都是神創造出來，所以放在這脈絡下就很震撼。

(羅：在七、八十年代捲入社運的基督宗教，當時新教是否缺席？)

我不敢講，當時團契是內向的，相對 KATSO，團契在校園裡相當有號召力，但就內向。我沒有認識其他人，唯一例外是廖寶泉。廖寶泉是基督徒學生運動的始創人，廖寶泉的太太是徐珍妮，她和我同屆，曾一走上宗教課程，廖與我不太熟但都相識。我畢業後有一年廖寶泉剛組成 SCM，然後邀請我跟一班學生分享，我已經忘了自己講了甚麼題目，最深刻是那個聚會的地方：九龍城寨。

當時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(**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**，簡稱 **CIC**) 是很突出的，但不屬於校園的。除了勞工，當時有好多與社會民生相關的政策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都會參與，因為劉千石不多不少成為 **figure head**，凡是民生政策等問題記者就會訪問劉千石，如巴士加價。劉千石本身牽涉的議題都很多，不只是工人，我記得地鐵工人罷工，學生有去支援，當然劉千石、司徒華都會出現；公務員總工會曾經好活躍(當時都受到劉千石的影響)。

(羅：當時基督教關注社運都是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這條線上？)

(劉：當年沒有了 SCM，如果連團契都如此靜，大專界應該都沒有事發生，那時學園傳道會也未曾出現，或者學園傳道會一向都不會關社，基督徒教會當時又未曾成立，女協是 1988 年...)

我太太是(更正教)新教，原本參加工委，她當時在八十年代協助爭取勞工法例：如爭取有薪假期及產假，所以跟 CIC 混熟了，CIC 在太子道有一間「西九龍教會」，那其實是劉千石的家，不過同時變成教會的會址。我太太在這間西九龍教會裡受洗，所以 CIC 在八十年代初這段時期，除了參與社會事件外，還有傳教這一面向。可惜西九龍教會在兩年前就結束了，因為我太太收到了告別儀式的通知，借了深愛堂舉行告別儀式，由陸漢思牧師做主持。

(羅：這些影響是否只是停留在當年的火紅年代，還是這種介入有更長遠的影響？)

真的很難判斷，我自己不太覺得有長遠的影響，唯一的可能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幹事會這層面，其實是相當開放的，即不一定是天主教徒才可以加入，雖然天主教徒仍是主要的成員，這可能是受我們能接觸的網絡所限，但亦有很多非教徒願意參加的例子；《曙暉》的層面就更為廣泛，有很多非教徒的參與。

(羅：那麼對人的影響呢？曾參加過 KATSO 或《曙暉》的人，跟那些一直都加入托派、國粹派的人，當中有沒有變化？還是 KATSO 只是其中一派？還是這種社運別樹一幟，連看事情的角度都是與別不同？或是參加聯會後對於人的塑造有沒有分別？你會如何判斷？)

最大影響就是影響了我，如果沒有這個團體，我會單調貧乏很多，也不會弄出曙光。對吳國昌肯定有影響，可以回到澳門後，差不多有一段時間是「one man band」民主派，當時《曙暉》這段經驗，對他肯定是有影響的。其他人都可能有，但可能體現在各自的崗位內。

(羅：這種很強的社運參與氣氛，直到何時開始沉寂？你們開創出來的運作方式，有沒有變得沉寂或常態化?)

在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層面，由七四年發展出來的方向，一直都保持到。問題到最近幾年，整個大專院校環境的改變，現在連 KATSO 都會員不足的問題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學校不再給予有宗教信仰學生的個人資料，我們就難以主動辨認和接觸信徒，變得要自己在學校擺攤位

被動地招收會員；當 KATSO 會員極為不足，自然影響到運作。

(羅：你一開始提過早期聯會的性質是聯誼，後來變成社關團體，目前的 KATSO 又會不會變回聯誼的組織？)

KATSO 這組織以靈修性為主，活動範圍主是大專院校內，主要舉辦靈修性的活動，或者有時舉辦一些與信徒相關的研討會。不過因為每間院校 KATSO 的屬會，都要派人來出席議會，討論幹事的做法是否恰當，從名義上是屬於最高權力架構；運作上這議會變成 KATSO 成員的接受教育機會，因為 KATSO 內部只會專注靈修性的事性，我當年去參加議會，見識到其他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，但假如現在組成不了 KATSO，就沒有人去議會，猶如輸送帶斷了一樣，這就是近年出現的問題。我記起三、四年前，當陳士齊仍在社民連的時候，他找我到社民連去分享，當時有個天大聯幹事走過來自我介紹，還提及到他們關社的取向，所以由 70 年代直到 2005、06 年，我覺得整個社關方向都一直保存住。

(吳：《曙暉》何時停刊？)

我是 78 年第一次搞書展籌錢，79 年畢業後仍有一段時間在《曙暉》，後來太老而沒有留下，但有搞書展，所以每年仍然有經費，去到 84 年我自己開書店後就無再搞書展了，可能就沒有經費而停辦，不過我也不太清楚。我畢業一兩年後就沒有再跟進了，接上來的人如何也未知。

(劉：85 年仍然有《曙暉》)

(吳：年輕的學生有沒有找你問西馬理論或解放神學？)

我們的傳統是不會找「老鬼」問，任學生自由發揮。

(羅：但似乎天主教界就好像消失了，或者被邊緣化了。)

今年聯會慶祝成立五十周年，不過我認為我們那段時間是屬於異數，因天主教組織層級化，一般教徒是環繞堂區運作，比如我曾做過崇基 KATSO 會長時只搞靈修活動，但反應很冷落；有些同學在自己的堂區內非常活躍，所以不覺得有需要參加校園的 KATSO，那時 KATSO 的

同學如此自主獨立是異數。我回想遺憾的地方是我 77 年當會長的時候，沒有承接或推廣「Option for the poor」這轉向，令這停留在口號的層次而沒有深化和變得堅實，特別是針對那些活躍於自己堂會但對 KATSO 不感興趣的人。

我當時感到教區好像不願意理我們，我們存不存在都不重要。聯會存在是靠一位耶穌會神父，算是較開明的。天主教教區對我們愛理不理，特別是有一回我們在教友總會的周年大會講「金禧事件」，當時我們被慘罵和驅趕，甚至有段時間明愛更打算收回我們的會址，最後好像有一位神師為我們護航才保住會址。直到我卸任後數年，即大概是 83、84 年後，教區才開始重視聯會這個組織，甚至教區主動撥款請兩名全職的員工協助一些組織的工作，例如聯絡不同的 KATSO 成員，可見教區對聯會的重視程度。

(羅：那麼何時才開始提供資源給聯會？)

聯會於 1960 年成立，已經提供此會址至現在。最初 20 屆都沒有職員，也沒有錢下來，自己籌錢做事，當時相對獨立。

(劉：兩三年前我與聯會合作，也包括六、七個青年組織，打算弄一個青年政綱，不過後來又解散了。當時我們討論驗毒的立場時，他們要先詢問教區的意見才可以簽署聲明；於是我問他們有沒有嘗試過做一些事，是沒有受天主教教區同意呢？因為現在凡是關乎時事的議題和立場，是需要諮詢天主教時事委員會的意見及批准。後來對方回覆，唯獨「金禧事件」是不符合教區的意向。)

這種要諮詢天主教時事委員會的做法是「金禧事件」後才開始發生，因為當年無論做任何行動、發聲明，全都是獨立的，無須請示任何人。

(羅：反映在這些大架構中存在彈性和自主性，例如不需向明愛負責，也不會跟你們算帳，不會是 N 條路線在互相鬥爭)

所以我一直遺憾自己沒有鞏固和深化「Option of the poor」、「教會本土化」這些理念。